

陶蔚然 胡性阶等 著

中统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亲历者讲述

ZHONGTONGNEIMU

中统内幕

陶蔚然 胡性阶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者讲述:中统内幕/陶蔚然 胡性阶等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5034 - 2346 - 8

I. 亲… II. ①陶… ②胡… III. 中统局—史料 IV. D693.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573 号

责任编辑:曾小丹

装帧设计:林红红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 编:100811

印 装:北京凯通实业总公司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990 1/16

印 张:23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8000 册

版 次: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中统概况	陶蔚然 (1)
中统沿革	胡性阶 (22)
中统头子徐恩曾	邵 平 (29)
中统电讯机构的方方面面	毛兆椿 (37)
中统特务渗入行政机关活动情况	杜超群 (55)
中统向司法部门渗透点滴	郑大纶 (71)
中统在部分省市和交通系统的组织活动	杜超群 (84)
武汉行营侦缉处的特务活动	夏仲高 (106)
受命起草《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牛道一 (111)
我参与中统破坏中共四川青眉中心县委的经过	苟怀谦 (117)
江西马家洲集中营血腥内幕	施 锦 (120)
中统与英缅当局一次流产的情报合作	李汉元 (129)
中统特务在重庆	刘介鲁 (133)
在重庆期间的中统局本部	李 英 (152)
中统特务在四川的始末	张元佑 郑万禄 (172)
成都新闻文化界的中统特务活动	李 英 (187)
中统特务在成都的“社运”活动	张元佑 (199)
第三经济检察大队在自贡	陶蔚然 (217)
中统运用的战时人才调剂协会	李约勒 (228)
云南中统组织始末	孙秉礼 (234)
中统特务在西康	张元佑 唐启昆 (244)
中统特务在广西	梁昌汉 (248)
抗战时期武汉中统的“地下工作”	舒靖南 (254)
中统特务在安徽立煌的罪行	舒靖南 (261)
中统西北区概况	王从光 (264)
中统和日伪的勾结	牧 子 (274)
中统特务在上海	陶蔚然 (285)
中统外延单位的内幕	李约勒 (303)

2 亲历者讲述：中统内幕

昆明“一二·一”惨案前后	刘介鲁 (309)
中统特务对北平军调部的捣乱活动	班志洲 姚晋榮等 (318)
中统破坏武汉学生反美爱国游行纪实	舒靖南 (322)
武汉六一惨案亲历记	舒靖南 (325)
破坏天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梁子青 李汉元等 (333)
中统与浙大于子三事件	刘怡生 (340)
北平解放前夕的中统	班志洲 (344)
“党通局”改“内调局”的经过	沈重宇 (350)
内调局垂死挣扎罪行点滴	吴汝成 (353)
面临末日的中统特务	赵象彬 (355)
短命的川康滇边调查处	文介夫 (358)

中统概况

陶蔚然

一、中统的几个重要头子

中统特务组织，从20世纪的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始终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直接掌握之中，其间组织名称多次更改，而以1938年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1947年改称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存在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中统组织中的几个重要头子，几乎完全是二陈的私人。兹分别介绍于下：

陈果夫，浙江吴兴县双林镇人，是陈英士的亲侄子。在北伐以前，与张静江等在上海经营交易所。蒋介石未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前，就在陈家开设的证券号内充任职员。缘此蒋介石对陈极为信任。及蒋掌权以后，陈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导淮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苏、浙、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后改称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处长（主管全国党政人事）。在国民党内为蒋的死党，为中统特务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举凡中统的重大问题需要蒋介石批准的，几乎都由他向蒋请求解决。因他患有严重肺病，故关于中统的具体事务，概由他的亲弟弟陈立夫负责。平时，从未见他来过中统。我在中统十几年也未见过一次。全国大陆解放前陈果夫去了台湾。

陈立夫，为陈果夫的同胞兄弟。北洋大学毕业后，曾留美专攻矿冶，返国后并未从事科技工作。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在北伐军总司令部任机要秘书兼调查科科长，专门负责情报工作，为国民党内干特务活动最早的一个。蒋介石到了南京以后，他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庶务科科长，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不久即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有时称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第六部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他是中统特务组织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抗日战

2 亲历者讲述：中统内幕

争前在南京时，他经常到特工总部去，每年特工总部举行“烈士”追悼会及联谊会年会时，他总是亲自主持。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每星期三上午便到特工总部大礼堂向专任人员讲解他自己所著的《唯生论》。平时也经常召见特工总部所属地方单位负责人，指示活动方针。中统特务组织从小到大的各种活动，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全国大陆解放前陈立夫去台湾。

叶秀峰，江苏扬州人，早年与陈立夫在北洋大学同学，毕业后又一同赴美留学。他因此关系跟陈立夫一同进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当陈立夫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他继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但不过数月，即调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后又续任西北工学院院长，西康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等职。1945年春，徐恩曾被蒋介石撤职以后，叶又出任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中央党员通讯局局长，至大陆解放前夕去台为止。叶秀峰虽然是中统特务组织的老人，以后又回到中统任局长，但中统组织内部的十之八九都是陈立夫与徐恩曾的私人，以后又多了朱家骅的一些人，所以他在人员的指挥上并不能得心应手。加以气量狭窄，特别在钱财上过于斤斤计较，老资格的中统特务们都瞧不起他。因此他回任中统局局长以后，就大肆开办各种训练班，培养嫡系以挽回在人事上遭受到的困难。但为时已晚，临到南京中统局本部人员集中上海办事处循海路逃广州转往台湾时，就发生了一场闹剧：工作人员群起以手枪相逼，要叶发给每人安家费黄金若干两，否则一个也不走，而且也不许叶走。所以他是在内外相逼、无可奈何的情形下，逃往台湾的。在他逃台之前，把历年搜刮人民的血汗所得交其独子，搭太平轮赴台，诟料太平轮并不太平，在台湾海峡遇险，一生所敛财物连同其子全部沉入海底。

徐恩曾，又名可均，浙江吴兴县双林镇人，与陈果夫为中表弟兄。在上海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毕业后，赴美留学，专攻电机，在美曾与陈立夫同学。徐返国后，因陈立夫的关系，先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任委员，后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庶务科科长，不久继叶秀峰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1935年，调查科扩大为处后，徐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37年秋，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少将组长。1938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局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1945年因贪污中英情报所经费及其他案件，蒋介石要处其死刑，经陈果夫、陈立夫等多人力保，改为“撤尽本兼各职，永不叙用”。1947年又被选为“国大代表”，在上海经

营轮船公司、农垦公司、渔业公司等。全国大陆解放前夕，携妻费侠逃往台湾。徐恩曾自1930年到1945年担任特务组织的实际负责人达十多年之久。其间中统所有的重大活动、重要决策措施，无一不是他一手策划。他在中统特务组织内部，更具有特殊力量，即使他被撤职以后，中统老人对他还是念念不忘，恭敬异常。

张冲，浙江乐清人，曾留学苏联，并娶一苏联女子为妻，很早就任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总干事。1931年特工总部刚成立时，即任行动大队副队长，与徐恩曾一样也是陈立夫的得力助手之一。以张的才干来说，应该在徐恩曾之上。当陈立夫升任中央秘书长，让出调查科科长时，张认为这个科长应该落在自己的头上，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在徐恩曾之下仍当总干事。因此他既看不起徐恩曾，又对陈立夫不满，不久即离开了调查科，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俄国顾问事务所主任。不久，蒋介石又拒绝与苏联合作，俄国顾问返国，张无事可干，出任中央电影摄影场场长，不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抗战前夕，又任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务所总干事。虽然张在调查科与特工总部内部工作时间不长，嗣后，表面上离开了调查科，但其活动还是在陈立夫的掌握之下。

濮孟九，江苏松江人，留德学生，返国后就在调查科任干事。徐恩曾任科长后，濮即升任总干事，兼特工总部秘书，是徐恩曾手下的大将之一，专负内部事务处理之责。1935年徐恩曾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以后，濮即任调查处处长。以才能来说，顾建中等远在濮孟九之上，但为什么这个处长却由濮升任呢？主要是濮奴性足，易于驾驭。但也有人说是由于濮妻萧蕙芬与徐有染的缘故。1938年春中统局成立后，濮即任秘书，一直到1942年。在这十年中，特工总部内部文件与一般事务的处理，完全由濮负责。徐恩曾如因病不能立即处理的文件，濮即代拆代行。他跟着徐恩曾亦步亦趋，1942年后，调任国民政府粮食部督导室主任。日本投降以后，又出任安徽省某厅厅长，以后下落我不明。

顾建中，江苏金山县人，上海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毕业，与徐恩曾为同学，曾在原籍任县政府教育局局长。他的参加中统特务组织，一说是徐恩曾的同学关系；但也有说顾原来是改组派分子，后投靠了中统。1931年进调查科任干事及特工总部行动队队长，以后历任特工总部外事科、组织科等科长。1935年，由特工总部派任财政部与特工总部合办的盐务缉私督察人员训练班副主任。后该班结束，成立财政部盐务缉私督察处，顾担任处长。1940年，兼任中统局副局长。1941年任财政部盐务总局帮办。1945年后，又任财政部盐务总局副局长职务。全国

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顾在中统特务组织中，可以说是罪恶最大者之一，同时也是极为蒋介石、陈立夫所亲信的人。中统对外活动均由顾建中负责，所以顾又是徐恩曾最主要的助手。举凡在抗日战争以前，中统特务组织危害中共地下组织的重大行动，无一不是顾亲自策划，有时还亲自参与行动。他是替蒋介石立下了很大功劳的。他在担任财政部盐务缉私督察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时，由其带进训练班任职员及受训的中统特务达两百余人。训练班结束，受训人员毕业全部分到沿海盐场任盐务缉私督察员，拼命搜刮，使盐税收入总额超额两倍以上。迨日军占领两浙两淮盐场以后，他又带领全部缉私人员转往两广盐场，组织运输大队，抢运食盐转往后方，因之极为蒋介石所信任。可以说他为中统特务组织打开了财政部门的大门，首次达到了打入政府部门做公开工作的目的，也为中统特务与孔祥熙勾结，使中统特务源源进入财政系统奠定了基础。顾在中统特务组织中，是最得人心的一个。他对人和蔼，一天到晚总是嘻嘻哈哈，大家对他特别恭顺，都叫他顾先生或老顾。他当了中统局副局长以后，还是一样。有时发布什么命令，徐恩曾说了还有人反抗，只要是他说的，大家都说顾先生说得没有错。

王思诚，四川白沙人，中央军校六期特警班毕业。毕业后集体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有人说他原是国民党内北方派张厉生组织的小派系——新中华革命青年社的分子，以后投靠中统的。但我与他相处四五年，平时无所不谈，他从未谈到过有关北方派的情况），为中统特务组织内部军校系首要人物。初进调查科时，还只是一个干事，不久即任特工总部首都实验区区长、机要室书记。迨中统局成立，即任局本部第二组（党派工作组）组长，一直到1942年升任局本部秘书。日本投降前夕，调往粮食部继濮孟九任督导室主任。以后情况不明。他在特工总部内，是濮孟九的秘书，为人较老成持重，因之极得特工总部的几个头子的信任。他在中统特务组织十余年中，各种反共的文件，大都由他作最后修改或出于他的手笔。如1940年中统开始建立党员调查网前的一切文件，都是他拟订的。他在中统，号称党派工作专家。

刘次箫，山东人，为山东著名的大学教授，有“山东才子”之称。他本非CC系分子，与中统也无丝毫瓜葛。但1939年朱家骅继叶楚傖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并兼中统局局长以后，才由朱家骅拉进中统局任秘书。朱家骅把他作为企图从二陈手中夺取中统特务组织的开路先锋。朱的私章交与刘，一般文件，只要刘同意，即可代行。但朱家骅这个企图最终落空：刘初进中统时，人们都不理他，甚至工友也以冷漠

态度对之，有些人还故意指着刘问别人：“这人是谁？”所以刘在这种环境中，对任何人都是笑脸相迎，对徐恩曾更是恭敬。他自知想打进陈立夫、徐恩曾二人多年掌握的中统，实非易事，终于在1940年自动离开了中统，也算是知难而退吧。日本投降以后，又由朱家骅介绍，在山东青岛市任山东大学教育长，以后又出任青岛市参议会议长。他在山大任内，勾结特务拟制学生黑名单；在青岛解放前夕，美海军正拟撤离时，刘又以“代表”青岛市民名义，到美军第七舰队司令官处，请求美海军不要撤离青岛等。他于解放后在青岛被人民政府镇压。

郭紫峻，山西人，他原是CC系分子。由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提拔，很早就任陕西省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兼中统特务组织在陕的最高领导人。但在1939年以后，又与朱家骅勾搭。因为朱从外面派人打入中统来夺取领导权不起什么作用，乃从中统内部拉人。由朱向蒋介石推荐，任郭为中统局副局长。朱的目的是想叫郭来夺取徐恩曾在中统的权力，因徐那时也是副局长身份。但郭原属CC，此时虽与朱勾搭，并没有脱离CC，且徐总是郭的上级，因此突然与徐抗衡，郭也不敢。并且他深知中统特务组织，不是别人所能夺取的。所以受命以后，只到过中统一次。但就这一次，就被中统老人冷嘲热讽。从此郭还是回到西北，以后来重庆时，就只偶然到中统走走。一直到1945年春徐恩曾被撤职，叶秀峰继任局长以后，郭才回中统局。日本投降以后，郭以副局长身份，出任中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大肆劫收。全国大陆解放前逃往台湾。

王述先，河北省人，他原是张厉生组织的国民党北方派新中华革命青年社分子。后张投靠二陈，王等也进入中统，为中统内部北方派首要人物之一。1932至1934年间，王在南京由中统派任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收音人员训练班训育长。嗣后一度在特工总部任总督察。以后即离开局本部，在地方搞党务活动。1945年叶秀峰任中统局局长以后，才回局任主任秘书，一直到全国大陆解放前夕。他是叶秀峰的主要助手之一。

季源溥，江苏沭阳人，原为汪精卫的改组派分子，在1932年前后投靠中统。为时不久，即得二陈及徐恩曾的信任，任特工总部南京实验区区长。1933年又因青帮帮会关系和特工总部的推荐，出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总队队长。1935年，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去职，蔡劲军继任，季也离开了。不久季又利用改组派的旧关系，任铁道部劳工科科长。1936年，交通部增设调查室，由特工总部推荐季兼任调查室主任。中统局成立以后，中统给以专门委员名义。1944年回中统局本部任第二处处长。

日本投降以后，以中统局特派员身份任上海办事处处长。1947年升任中统局副局长，1948年改任内政部调查局局长。西南地区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他在中统特务组织的历史并不太长，但升迁之速，除顾建中外，无出其右。这主要是因他在中统特务组织中，立下过很多功劳。如他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总队队长时，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掩护中统特务在上海肆无忌惮地绑架中共地下人员。以后他又先后利用铁道部劳工科和交通部调查室名义，调查工人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他还在抗战后方成立“中国劳工协进会”，吸收大批人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并将大批中统特务渗入交通部门，进行特务活动。日本投降以后，在上海主持劫收，为中统发了一笔胜利财。1947年又破坏了中共华东局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逮捕了三十余人，是为日本投降以后，中统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最大的一案。

张国栋，福建人，原为旅日华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毕业（即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以后又赴日本，1936年返国。初在南京特工总部任情报科副科长，后升科长。1938年中统局成立以后，仍任一组二科（情报科）科长，嗣后又升任一组（总务文书情报）组长。日本投降以后，又升为中统局局本部秘书。全国大陆解放前逃往台湾。他在中统的历史短，专搞一般的情报处理编辑工作。因为他生长在日本，对日本情况比较熟悉，在中统特务组织内是个日本问题专家。他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爬上秘书的位置，主要是因他是陈果夫的学生，再说他为人谨慎，终日不声不响，对上级命令从不打折扣，有时还能逆来顺受，当时都把他看作是“老实人”。

二、与国内新军阀的斗争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在统治集团内部充满着斗争。各省新军阀无时无刻不在计划着推倒蒋介石，蒋介石也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段对付、收买他们。中统特务组织在这方面是为蒋介石起了不小作用的。如蒋介石企图打开四川大门，曾派过一个军事参谋团，而这个参谋团中，就有大批中统特务，如赵冰谷、齐耀荣等，都是这样进入四川的，且都带有无线电台。这些人侦得了四川的刘湘串通山西阎锡山倒蒋的密谋。1932年，中统特务还收买了山西阎锡山手下专搞密码工作的李直峰，于是对阎锡山的种种倒蒋活动了如指掌。在四川刘湘的密电中，也侦知了刘湘的各种政治活动。

各省当局当然知道蒋介石派遣特务进行活动，因此同样地用各种手

段来对付。如1933年前，中统曾派黄树芬、王思诚二人在太原以开设书店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阎锡山侦悉后，即借故将黄、王二人关押起来，并查封书店，后经国民党中央几次交涉，才将其释放。又如1935年山东韩复榘借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三周年纪念大会之机，指使便衣持手枪打死了正在台上讲话的中统派在山东省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的张苇村。张被杀以后，二陈迭次函电要韩破案，并缉拿凶手。韩无法应付，又将二陈派去山东活动的另一特务谌峻岑（当时公开身份为铁道部劳工科科长）逮捕关押起来，并硬说谌与张争功夺权，由谌指使别人将张杀死。韩并以此捏造之事实告诉二陈。二陈明知是韩的花样，于是电告韩暂将人犯关押，不日派人赴山东提审。韩见事已至此怕不能应付，又将谌在狱中勒死。迨二陈所派的人到济南时，韩已将谌埋葬了事，并说谌在狱中畏罪自杀身死。

三、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斗争

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各种小党派，它们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而中统特务组织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则专门搞了许多有利于蒋介石的鬼名堂。

1930年以后，丁惟汾等西山会议派已经气息奄奄；汪精卫的改组派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亦成强弩之末。这种有利蒋介石的局面之所以造成，中统特务组织是有一定功劳的。比如对汪精卫的改组派，中统特务采用各种方法在其内部予以分化，用高官厚禄引诱改组派中上层分子顾建中、季源溥等人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有些还留在改组派内，侦查改组派的反蒋活动。同时又对汪精卫以及改组派中的主要人物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褚民谊等人进行舆论攻击，如中统特务组织在上海出版的对外刊物《社会新闻》（1935年以后改为《中外问题》），经常登载这些人的家庭秽事以及改组派官吏的贪污舞弊事实，并加以扩大甚至捏造。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又特别宣传汪精卫等投降日本的主张。除以上方法以外，还在政治上打击改组派，如国民党历次选举中央委员时，中统总是倾全力拉走改组派人物的选票。中统特务还经常搜集改组派的各種政治主张、活动等，编印单行本向社会散发，如在1935年时曾分发过《一年之内之改组派》一书。中统特务对改组派进攻之剧烈可见一斑。久而久之，改组派力量逐渐缩小。

但汪精卫不甘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就这样轻易地丢掉，于是不

停地向蒋介石及中统特务进行反攻。首先他在改组派掌握的机关中严防中统特务的渗入，当时如顾孟余的铁道部、陈公博的实业部等机关，中统特务是无法混进去的。汪还利用一些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提出缩小或取消党内的特务组织的动议。蒋、汪之间斗争表现得最露骨的一次要算是汪精卫在南京开会时被人开枪打伤事件了。

1935年，国民党中央在南京中央党部第二会议厅召开大会。汪精卫以副总裁的身份带领参加大会的全体中央委员在会议厅门前拍照。摄影完毕时，突然有人以枪射击。顿时第二会议厅门前乱成一片，拼命逃跑者有之，跌倒在地者有之，谁也不知道子弹来自何处，更不知道何人死伤？几分钟后，才由张学良抱住凶手，冯玉祥的卫士将凶手打死。于是中央党部的保安队在中央党部内部到处布岗追查。此时中统特务派去的一个女特务王立文（留苏归国学生、中共叛徒），于凶手开枪打伤汪精卫以后，即利用中央党部的电话向中统南京实验区所办之民族通讯社报告汪精卫被刺情况。此时中央党部的保安队，将王以嫌疑犯身份扣留，并对王携带之公文包进行搜查，发现公文包内有《一年之内之改组派》一书。汪妻陈璧君得悉这一情况后，即向蒋介石大哭大闹，要求立即交出主谋者，并一口咬定是二陈所指使，当场痛骂陈立夫，为什么对改组派进行攻击？蒋介石只好叫陈立夫命令中统特务限期破案，缉拿主谋者。

此案发生确有蹊跷。主要是开大会那天蒋介石也在，那为什么在拍摄全体照片时，蒋却在室内与几个人谈话，而叫汪精卫下去呢？其次，凶手近在咫尺连发三枪，为什么只打伤了汪精卫一人？陈璧君一口咬定此事是二陈指使，蒋介石事先知道的。再说在王立文皮包内发现了关于改组派的书，遂使陈璧君恨透了陈立夫与中统特务。

由于凶手被当场打死，此案就成了无头奇案。所以徐恩曾在瞻园路132号内布置查缉此案时，大家都摇头，认为无从破案。唯一线索是在凶手口袋中查出一张新闻记者的身份证，证实被打死的凶手为孙凤鸣，是设在南京石坝街的一家通讯社的记者。于是立刻派人到石坝街去搜查。到时，该社已无一人，满地纸灰，只见一个痰盂内有已经撕碎的纸，捡起拼凑，发觉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一个女学生写给这个通讯社社长贺坡光的一封信。于是根据此信立即以电报通知中统上海区派人将此女学生捕送南京，又依据此女学生提供的有关贺坡光的亲友关系，分批追捕。后终于在江苏丹阳县的乡间贺坡光的姐夫家将贺逮捕，并押回南京。经审讯，原来贺等都是改组派分子。贺谓此举完全是改组派的内部事件。汪精卫在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本时，曾允诺他们，事成之后都有大官可做，

谁知汪上台之后，并未实行当初的诺言。因之，贺坡光与余立奎等五六人合计杀汪以泄愤，乃开办通讯社，准备等国民党中央召开大会时行刺。预先计划主要是杀汪，如条件许可，还要打死蒋介石。手枪是放在一个方形的大照相机内带进中央党部的。谁知孙凤鸣于枪击之际，精神过于紧张，连发三枪，只打伤了汪精卫一人（编者按：此案另有一说，南京刺汪案是其他派系的反蒋人士王亚樵策划的，详情参阅本书所载麦朝枢撰写的《南京刺汪案和王亚樵》一文）。此案一破，汪精卫夫妇无话可说，但汪却从此知道蒋介石在指使陈立夫对改组派进行猛烈的攻击。所以当陈璧君看到王立文的这本《一年之内之改组派》时，对蒋介石说：“你同陈家兄弟对精卫下这样的毒手。”不管怎样，汪精卫此时已被完全搞垮，只好借医治枪伤之名到外国去了。但汪精卫并未完全放弃野心，西安事变时，汪在国外听说蒋介石被囚于西安，立刻中止医治，兼程返国，企图在蒋介石被共产党杀死以后，取而代之。詎料汪精卫如意算盘打得过早，他还没有回国，蒋介石已由张学良陪送回到南京。

蒋介石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敌是胡汉民。他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做后盾，另外还有新国民党的群众组织，在1934年前后，也曾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不久胡汉民病死，蒋介石就把新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刘芦隐拉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同时又任CC系的方治为副部长来牵制刘。而且在中央宣传部下面的几个重要业务机关，如中央通讯社、中央电影摄影场等等，都在CC控制之下，所以刘只是一个空头部长。1937年，蒋介石实行逃跑政策，刘屡次发表不迎合的谈话，颇使蒋恼怒。南京政府搬迁到重庆后，蒋就授命二陈，以刘是刺伤汪精卫的主谋将其关押，一直到全国大陆解放。

四、中统在蒋介石嫡系中的明争暗斗

中统特务组织，除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蒋的政敌进行疯狂打击以外，在二陈的指挥下，对蒋介石嫡系中的其他小派系同样进行毫不留情的攻击。正由于中统特务组织的疯狂活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

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陈立夫的选票总数竟超过了蒋介石，汪精卫的票数只够一个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相反的，中统特务中的一个科长级的张冲与CC系的津浦铁路特别党部的委员邵华却都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开票后，汪精卫目视

蒋介石作苦笑，而蒋介石也感觉到中统特务的跋扈，怒目而视陈立夫，还对陈说：“你们这是怎么搞的？”事后，陈召集了CC系的全部代表开会，他在会上指示，一定要使蒋介石的得票总数增加，超过陈立夫；几个资历较浅的人要把票数让给汪精卫。在会上几个资历较浅的人纷争不已，谁也不肯让出票子。结果陈立夫硬性指定邵华等几人改为候补中央委员。直到1938年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才被选为国民党的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从这件事，可看出中统在国民党内，特别是组织系统内形成了一股多大的势力。但其后果是二陈的政敌比蒋介石的政敌还多得多。因为他们一面要替蒋介石扫清政敌，同时又要打击自己的政敌。蒋介石的系统中还有很多小派系，如“政学系”、“黄埔系”等等，所以中统和这些小派系之间，就都进行着各种明争暗斗。

政学系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下有很多个部长，各省有不少省主席，其主要人物有杨永泰、张群、吴鼎昌、陈仪、熊式辉等人。二陈在政府中的力量，远不如政学系，所以总想打击它。但在当时这几个人物CC系还是推不倒的，于是目标转向政学系中的次要人物。首先被作为打击对象的是1933年时任江苏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的辜仁发。为什么会找辜做打击对象呢？原来1933年10月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民政厅厅长的位置被政学系的辜仁发夺去。而二陈本是想由CC系的人控制民政厅的，于是千方百计找借口想把辜撵走。正好辜把在南京时弄的一个小老婆带到镇江去上任，为此与丢在南京的发妻发生了争吵。中统组织侦悉这个情况以后，一面鼓动辜妻到法院告辜遗弃发妻，一面故意扩大事实，在京沪一带报纸上大肆宣传，说辜忘恩负义，遗弃发妻，决不能为“人民公仆”。而辜妻控告以后，在法院劝解下，已有撤诉之意，但中统却坚持法院受理，并逼法院出具传票。于是，事情越闹越大，终于把辜逼走，到江苏常州的天宁寺当和尚去了。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于1934年4月改由陈果夫自己兼任，旋即又由曾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余井塘接任。这样，中统与二陈的目的也得逞了。

中统特务组织对国民党的那些元老派如于右任、戴季陶以及“太子”孙科等同样进行攻击。如在上海发行的、由中统控制的周刊《社会新闻》上，经常可以看到“于右任嬖昵婢女”，“戴季陶吃荤玩女人”、指使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偷窃故宫宝物，“太子宠爱上海著名交际花蓝妮”等新闻，一时真假莫辨。面对此种攻击，这些元老无不吹胡子瞪眼，对中统恨之彻骨。因此中统特务组织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四面楚歌。

在蒋介石的统治时期，只有宋子文、孔祥熙二人依恃他们的特殊关系，谁也不怕，谁也攻不倒他们。他们自成一系，并不把其他政治派系放在眼中，对二陈及中统自然也是关紧着中国财政系统的大门。所以二陈与中统的势力在他们二人掌握的财政部门中极微，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但中统特务组织从未放弃渗入的企图。他们进攻孔祥熙，还是专找对方弱点那一套。一面在《社会新闻》周刊上经常登载“孔祥熙怕老婆”、“孔二小姐玩男人”以及“孔公馆”中的豪华奢侈的开支等等私生活的材料，一面则把调查财政系统中的贪污舞弊案件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中统收集了孔祥熙部下的大批贪污案件之后，分别情况，分别处理。如有的把全案抄送给孔祥熙，有的直接向蒋介石呈报，有的则将案犯逮捕后送法院。中统这些办法极为毒辣，若说不顾孔的面子嘛，它也把贪污案件抄送给孔；若说惧怕孔的势力嘛，它又会向蒋介石报告，并在各大报纸上大肆登载案件内容，以迫使孔祥熙不得不向中统低头。但孔也不会轻易把吃太平饭、发太平财的税务单位给予中统。1935年，蒋介石正大举向江西中央苏区进攻。打仗要花钱，而国库空虚，他就想在盐税上打主意。要想增加盐税收入，除了提高税率外，主要得从查缉私盐方面着手。但当时贩私盐的都属武装走私，一般财政部的盐务督察绝非其对手，所以大多数倒都是坐收贩私盐的贿赂了事。孔祥熙也明知其真谛，就把要拼老命的沿海盐务督察单位交给了中统。孔的如意算盘是：最难弄的事情给你做，看你能否做好，如弄不好就有话可说了。但在中统说来，只要有机可乘，什么都敢干。搞得好坏，那又另作别论了。就这样，经过几度磋商，1935年夏，由财政部与中统特务组织合作，在南京中山陵开办了一个“财政部盐务总局盐务缉私督察人员训练班”，中统人员一次就打入了两百余人。这也是中统望财政部大门兴叹的时代的结束。以后不但盐务方面，就连税务、货运、中国茶叶公司等单位中，也充满了中统特务。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连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等，也落入中统特务手中。从这个角度说，孔祥熙也是被中统特务所征服了。

除了孔祥熙以外，宋子文原先也是不理睬中统特务组织的。在蒋介石开始统治的十多年中，中统始终无从下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两者才交上了手。事情是这样的：中统上海办事处接收了南朝鲜侨民所办的大德昌烟厂。这个厂有上百吨烟叶存放在青岛银行仓库中。当中统接收大德昌后，没有立即派人到青岛处理，于是被宋子文辖下的敌伪产业处理局先下了手，将烟叶没收。当1945年底中统派人往青岛提货时，敌伪产业处理局拒不发还。于是中统与宋子文为争夺这批烟叶展开

了公开诉讼，一直到行政法院，结果宋不得不将烟叶发给中统。从此，中统在收复区的各大都市中所接收的敌伪产业，都即行占用，拒不交给各地敌伪产业处理局，敌伪产业处理局也不敢索取。到1946年底，敌伪产业处理局在拍卖敌伪产业时，将最高投标价格秘密通知中统，使中统独占承购权。所以这一个时期宋子文给中统不少小恩小惠。当然，中统的目的在于渗入宋子文所掌握的机构中，从而发展特务力量，所以在经济上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满足中统的欲望。但宋子文是不肯轻易开这个门的，因此中统和宋暗中较量的事一直没有停止。

五、中统和军统的明争暗斗

当中统特务组织（一度曾称特工总部）分支单位业已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在上海大肆破坏中共地下党中央及分支机构时，蒋介石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军统的前身，还只是在南京鸡鹅巷戴笠负责的复兴社下面的一个特务处而已，而十几年之后，军统的力量却要比中统大得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这是蒋介石的“哲学”，即对任何人从未完全信任所造成的。所以他虽一面给予中统逐渐扩大的条件，但在经济上却加以限制。另一面则极力培养戴笠的特务处，来牵制中统，以免他日尾大不掉之忧。于是这两个特务组织在十几年中，时时刻刻明争暗斗，甚至互相进行暗杀。

蒋介石在打败了国内的敌手、暂时统治全国以后，就专心致志地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力量了。于是中统特务组织很自然地充当了蒋介石的反共急先锋。

中统特务之所以能在1935年前大批地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并逮捕地下工作人员，主要是依靠中共叛徒提供线索，献计献策。而特务处只是几个中央军校毕业生，叫他们去杀人也许还行，但对于这些细致的秘密政治斗争，得不到丝毫线索，实在是无从着手。于是戴笠一面以高价来收买中统特务，特别是中共的叛徒，如1935年以前中统的一个南京实验区行动股长李齐及林某（均为中共叛徒），就在戴笠的重金收买下，秘密脱离中统，投靠了特务处。虽然这两人的所有线索，早已给了中统，不会再有什么有用的线索提供出来，但戴笠还是从他们手上获得了中共如何进行地下活动的一些规律。另一方面，戴笠要求蒋介石把几个重要城市的邮电检查工作与中统共同分担。戴笠的这个要求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想在一般来往函电中猎取线索，其二是可在中统的分支机构及特工总部